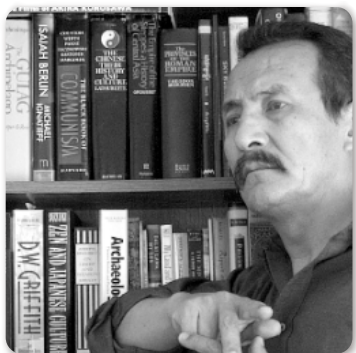


民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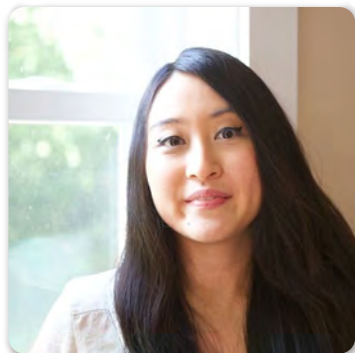
降央·诺布
艾美莉亚·庞

此访谈用英文进行，感谢专业人士晓义译成中文

汉化、种族 灭绝和西藏 的未来



降央·诺布



艾美莉亚·庞

编按：长期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即西藏行政中央）一直指责中国对藏人进行的是“文化灭绝”。但是，西藏著名作家、亚洲之巅研究中心（High Asia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降央·诺布（Jamyang Norbu）认为，“种族灭绝”才是更合适的说法。

《中国民主季刊》编辑艾美莉亚·庞（Amelia Pang）就此与降央·诺布做了访谈。诺布分析了1950年以来在西藏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认为中共的政策从未偏离过消灭藏民族这一最终目标。

本刊作为一个共享平台，致力于增进不同观点的相互了解、交流、交锋，欢迎持不同看法的作者赐稿。

庞：有些人担心“种族灭绝”这个词已被过度使用，一经如此就淡化了含义，而你却认为“种族灭绝”是准确描述中国政府怎样对待藏人的一个必要词汇。为什么你会这样呢？

诺布：首先要明确一点，发生在西藏的事情与发生在纳粹德国犹太人身上

的不一样。

而根据“种族灭绝”一词的创造者、波兰犹太裔律师拉斐尔·莱姆金 (Raphael Lemkin) 的说法,这个词未必意味着直接用暴力消灭一个民族。

参与发起《种族灭绝罪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 的莱姆金曾经说过:“(种族灭绝)是指一系列旨在破坏族群生活根本基础的、不同行为的协调计划,其目的是消灭该族群本身”。我认为这是“种族灭绝”的一个绝佳定义,所有藏人和我们的支持者都应该使用这一定义。并不存在一个把藏人关起来屠杀的计划,但是有很多分别的行动。不能仅仅因为不是成百上千规模性的杀人,就说它不是种族灭绝。

庞:我们就谈谈那些旨在破坏西藏生活根本基础的协调计划和行动吧。

诺布:首先一点,1959至1979年的西藏大饥荒是有意为之的。有些人将那场悲剧视为“中国大饥荒”(1959-1961)的一部分——“中国大饥荒”造成了5500多万人死亡。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1959年之前,西藏并没有成立人民公社,也没有经历干旱或农作物歉收。

许多西藏以外的人都不知道,西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农业社会。例如,西藏大量出产青稞,如果某个地区青稞欠收,可能会有小规模饥荒出现,西藏政府就会向该地区提供粮食贷款。西藏政府有一个能够非常有效地统筹青稞、荞麦,甚至小麦生产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在共产党占领西藏后就崩溃了。

在1959年3月的起义和达赖喇嘛逃亡之后，中国占领当局对西藏人民采取了惩罚性措施，没收了农民个体户的粮食，清空了整个西藏地区、寺院和噶厦政府的粮仓。而据达赖喇嘛说，“西藏各地的粮食供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很充足”，可到了1959年底，西藏开始出现老弱幼儿纷纷死亡的案例。随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面的饥荒袭击了西藏人口。

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族群遭受的饥荒比在藏地更严重。在那些年里，大约五分之一的藏人死亡。在现任达赖喇嘛的出生地青海省，至少有50%的人口就这样活活饿死。

西藏饥荒主要是由于粮食征收而造成的，这些粮食（部分）用于偿还中国在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对苏联的债务。甚至在甘肃（安多）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村民们也在挨饿，因为毛泽东把他们的粮食运到古巴去了。十世班禅喇嘛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西藏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饥荒是“官方决策的结果，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

西藏的这场饥荒堪比乌克兰当年的“恐怖大饥荒”（Terror-Famine，1932-1933年），当时斯大林惩罚那里的独立运动，数百万乌克兰人因此被饿死。然而，西藏饥荒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持续时间长。据记者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说，这场饥荒“持续了20年”。

庞：那么，1959年前后还出现了哪些运动？

诺布：1954年在西藏东部地区启动毛泽东的“民主改革”时，中国政府开始在那里大规模实施其劳改制度，包括实行强制劳动、监狱农场和矿山劳

改营等。

1959年3月之后，劳改营在西藏开始更广泛地出现。在那之前，中共政权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在西藏中心地带实施毛泽东的“民主改革”，而只在西藏东部地区有所推行。

1959年3月的起义之后，西藏的行政机构整个被解体了，整个社会基层结构被摧毁，大多数人被送去劳动改造。那些劳改营基本上是奴役式的劳动场所，没有任何劳动报酬，只有食物配给。口粮是定量分配的，仅够维持生存和体力劳动，并确保你听话、服从安排。

拉萨起义后，成千上万的西藏囚徒被送往拉萨东北部的纳钦德拉水电站强制劳动。旧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司曹（总理）洛桑扎西也被关押在这个劳改营，在那里服刑五年。另一个主要的劳改项目是位于湄公河上游泽维镇的果多水电站，该项目为昌都及周边地区供电，完全是靠劳改犯建起来的。这两个项目以及其他类似的劳改项目造成的死亡率甚高，堪比斯大林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死亡率。

监狱农场在西藏各地也很普遍，但波乌特拉莫（Powo-tramo）和贡波（Kongpo，即灵芝）的营地尤其值得一提，因为那里的劳改犯是在森林和处女地上开荒，建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都成了安置解放军退伍军人和汉族定居者的殖民地。

但劳动条件最恶劣的当属矿区劳改营，特别是在札咯布（Dartsedo）北部的牦牛坡（Yakraphug），据说在那里有12000名囚犯开采铅矿。这支劳动

队伍还不得不经常增补人手，囚犯们不断地死于饥饿和过度劳累。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扎塘地区的札拉卡尔波 (tsala-karpo) 铍矿劳改营，那里有过数以千计的藏人苦力。其他主要的劳改矿区包括安多的柴达木，那里开采的是盐和硼砂。

前西藏官员坚巴索帕 (Tenpa Soepa) 曾被关押在甘肃省酒泉市夹边沟农场。据他回忆说，该劳改营“关押了大约3000名政治犯，其中约2500人死在了夹边沟，大部分是饿死的”。

自1994年以来，中国重新命名了劳改场所，但这一庞大的强制劳改网络继续存在，专事生产出口创汇产品。

[编辑侧记：此外，最近有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自2015年以来，已有数十万藏人为了维持生计而离乡背井，从事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工作。该转移计划被描述为自愿的，但许多藏人表示，他们是被胁迫参与的。]

联合国指出，劳动力转移计划是由一系列“职业培训中心”网络提供的，这些中心不太注重发展专业技能，而更注重在军事化环境中进行文化和政治灌输。

联合国专家发现，被纳入劳动力转移计划的藏人被禁止说藏语或表达其宗教身份，因为中国共产党将这些行为视作“扶贫的障碍”。

联合国警告说，劳动力转移计划与它所声称的改善生活条件的目标相反，可能会使藏人进一步陷入贫困和强制劳动。]

庞：你认为1950-1975年间发生的大屠杀是中共种族灭绝运动的又一个例子，对此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诺布：1950年解放军入侵昌都时，藏军确实进行了抵抗。不幸的是，很多历史学家在这一事件的叙事上都对共产党持同情立场。他们相信了中共宣称的“和平解放”，但实际上那是一场大屠杀。如今在这些地区的不少地方，人们仍能发现那些“万人冢”，特别是在甘肃、青海游牧地区，以及在更往南的地区修建公路时发现的。因此绝对有理由认为，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

根据历史学家艾略特·史伯岭 (Elliot Sperling) 的说法，“大约在1950年至1975年期间，西藏发生了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中许多大规模的杀戮发生在安多和康巴等地区 and 部落的起义之后，中国军队的报复行动导致部落和社区出现大规模屠杀，堪比美国军队在伤膝河 (Wounded Knee) 和桑迪溪 (Sandy Creek) 对美洲原住民进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

庞：中共非常热衷于批评美国，却掩盖西藏的大屠杀与美洲原住民遭遇的伤膝河与桑迪溪大屠杀之间的相似之处：妇女、儿童和老人惨遭杀害。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诺布：美国的民主远非完美，美洲原住民的经历确实是悲剧性的。当然，我们不应该把发生在美洲原住民身上的事情直接拿来比较。但在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他承认美国曾虐待原住民，并承认美洲土著民是这片土地的原初占有者。

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保存了关于大屠杀和美国政府破坏条约的详细记录，让我们记住了这段历史。

诺布：这些悲剧的发生，很多都是出于贪婪，在那里不幸发现了黄金，美国勘探者很快占领了该地区，致使原住民采取了报复行为。但是在西藏，情况从来都不是这么回事。对藏人的杀戮并不是在误解或贪婪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总是自上而下的，总是来自解放军的官方行动。

在早期的流亡藏人出版物，如《西藏勇士》(Warriors of Tibet) 中，对西藏的一些屠杀事件已有记载。最近有更多的来自西藏境内的著作——如雪顿(Shokdung)、纳仓努洛(Naktsang Nulo)，以及藏人以外的专家，像弗朗索瓦兹·罗宾(Francoise Robin)、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李江琳、本诺·韦纳(Benno Weiner)等人的著述，显示了对这一悲剧的更深入研究。西藏流亡政府估计在这一时期有120万人死亡。尽管由于没有中方的记录而无法知道确切数字，但历史学家艾略特·史伯岭指出：“发生大规模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已故十世班禅喇嘛也试图记录这场种族屠杀。1987年3月28日，他在北京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自治区小组会议上发言时说：“在安多和康区，人们遭受了难以形容的暴行。人们被机关枪扫射屠杀，都就地掩埋了”。

庞：真是人间惨剧，竟然发生过这么多生灵涂炭的事件。

诺布：与大屠杀不同的是，西藏发生的杀戮无休无止。共军一遇到麻烦就后退一下，比如当他们兵力不足，难以应付高海拔作战的时候。有些部队甚至因为受不了藏区的高寒荒凉而反叛。每当解放军无法彻底镇压一场起义时，他们就会制定所谓的自由化政策。他们指派藏族喇嘛、藏族领导人到这些地区说：“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再执行那些政策了。一切都改了，

一切都好起来了”。他们可能会来它个两、三年的‘民主改革’，让西藏人民相信改革是真的，然后他们又会老调重弹。中共一直善于欺骗，他们不会只发动一次性运动来进行种族灭绝。

庞：铲除藏语的努力是另一运动的实例，目的是摧毁藏人生活的根基。

诺布：在西藏，特别是在西藏东北部、甘肃、青海和边境地区，中共早期就曾实施过语言限制政策。藏语教学必须叫停，代之以汉语。

这些地区的藏人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示威。各所学校、大学都在示威，甚至远在北京的大学生也罢课了。因此，中共曾有几年以退为进。他们意识到如此直接地限制语言是行不通的，所以现在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幼儿身上。

中国当局在西藏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区的中文寄宿学校网络，将藏童与父母和家庭分开，减少他们与母语和文化的接触。根据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的一份详尽而权威的报告，有超过80万名6至18岁的藏族儿童（占学龄儿童的78%）遭遇强制性就学。学校的课程主要使用汉语授课，并进行密集的政治灌输。联合国还发现，中国的寄宿学校已使百万藏族儿童与家庭分离。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在执行其计划时有很大的灵活性。现在发生的寄宿学校现象并不新鲜，只是换汤不换药，变本加厉推行的还是同样目的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破坏藏人的身份认同。

达赖喇嘛的行政机构和其官员可能会把这种寄宿学校称为“文化上的种族

灭绝”，但我认为没有“文化种族灭绝”这回事，我们必须就称它为“种族灭绝”。

庞：那么铲除藏人身份始于何时？

诺布：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的，藏文化成了“四旧”之一。他们试图强迫人们不再说藏语，这就造成了一些非常怪诞的情况——西藏的高级领导人试图对公众说汉语。当然，他们无法正常进行表达，说汉语就成了一个可笑的幌子。而且从1966年开始，西藏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当然，宗教也被完全禁止。这对藏文化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影响。

庞：中共几十年的汉化努力是否成功？

诺布：大多数藏人不希望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历史意识。西藏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是个独立的帝国，他们曾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唐朝—并驾齐驱。

大多数藏人都有着种族记忆。而中国政府最新的寄宿制学校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记忆。当孩子们不再说藏语，并被带离他们的藏族父母时，他们就开始不再认同藏文化了。这与加拿大开设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类似。

[编辑侧记：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加拿大政府将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家庭和社区带走，将他们送到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由政府资助，由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管理，其宣称的目标是将土著儿童同化到加拿大社会中。]

寄宿学校里的学童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不能实践他们的文化，或不能与他们的家

庭保持联系。他们经常遭受体罚和性虐待，许多人因疏忽或疾病而死亡。寄宿学校中的死亡儿童确切数字不详，据估计有数千人。在以前的寄宿学校附近仍有发现无名坟墓。

2007年至2015年期间，加拿大政府提供了约7200万加元资助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花了6年时间走访加拿大各地，听取了6500多名证人的证词，记录了这些学校里发生的虐待行为。2015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综合报告，作为寄宿学校体制的历史记录。]

诺布：2022年，教皇方济各前往加拿大会见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并代表天主教会发表道歉声明。他承认那是一场种族灭绝。他使用了“种族灭绝”这个词。

庞：藏人是否可望有朝一日能得到中国的类似承认？

诺布：这是我们社群内部的一个问题。宗教领袖，如达赖喇嘛，始终在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当然，他不会得到的，但中国政府总让他满怀期待。对他来说，希望总是若隐若现。

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它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巨大的分裂。有些人忠于达赖喇嘛，试图走“中间道路”，心心念念的是“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平等和相互合作基础上和平共存”。他们在试图与中国达成相互理解，尽管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些团体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影响，说什么真正的问题是西

藏民族主义，说这阻碍了他们达成理解。这种看法给我们社群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如果现在有人试图表达西藏民族主义，就可能被指责为反对达赖喇嘛。

中共非常精于运用这一战略。随着他们的统战工作继续影响我们的社群，这已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它真正削弱了藏人的行动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经有过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相当强势。但由于我们自己社群内部的分裂，现在这些行动都被极大地削弱了。

庞：真是遗憾。在西藏境内，上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在2008年。什么东西变了？为什么那样的抗议活动如今在西藏变得不再可能？

诺布：中国在国内维稳上的花费超过了国防开支，其中大部分开销都用在了西藏，然后又是维吾尔族地区。大约从2008年开始，他们在西藏各大城市架设起非常复杂的监控系统。他们有层层的线人。他们以学校为目标，沿袭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做法，比如鼓励孩子们告发自己的父母。

2008年以后，他们还在西藏部署了更多的兵力，并设立了再教育营，如今还发展到维吾尔地区。西藏的很多再教育营就干脆设在有寺庙的深宅大院里，省了建造之劳。由于许多参与反共示威活动的人士最终都被关进了这些地方，这些寺院变成了政治改造的场所。

发动起义需要人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协调。但自2008年之后，中国加大了镇压的力度，任何人的商议协调行动已经变得不可能，跟朋友不能谈论，跟自己的家人也不能谈论什么。

所以从2009年开始出现了藏人自焚抗议行动，以抗议镇压。抗议的唯一方式成了买一罐汽油，拿个打火机，在街市广场上自焚。且这不仅仅是个别的行为，而是一个整体的现象。迄今大约已有165名西藏人自焚而死，世界其他地方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自焚的抗议者多是年轻人，他们本来可以是站在起义最前沿的人。

庞：这对于西藏的民主未来意味着什么？

诺布：目前在西藏确实还看不到民主的未来。在俄罗斯都还有几个勇敢的民主反对派，但是在中国，找不到这样的反对派。

别想什么民主了，甚至连保留藏人身份都相当困难。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变得强大起来。2008年以前，人们还能常常徒步翻过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在海拔超过19,000英尺的地方，解放军追赶不上他们。但今天人们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有卫星技术和无人机，要离开西藏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想方设法地跑掉了，中国也已经贿赂了尼泊尔政府，可以让其将所有的西藏难民遣返中国。

所以我真的无法确定未来的情况。但是我抱着一线希望，因为体制变得越僵化、越专制，就越从根本上削弱自己——尽管仍可能有效地执行其镇压政策。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已经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反作用，这让我感觉藏人可能仍有希望。

庞：那么你希望的未来是什么呢？

诺布：中国的政权不会转向民主制度。我知道可能是想入非非，但也许某种内部冲突可以瓦解这个政权。

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中国的解体。不是像军阀混战那样的解体，而是或许可以像欧洲那样。中国的许多省份的面积与欧洲的大国相当，也许不同的省份可以成为独立的国家，各走各的路。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就有希望了。

这就是我自己粗浅的主张。可以把台湾看作一个起点，接下来是香港、西藏。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在世界的这块地方出现10个、15个或20个独立国家的未来。这将为文化和商业创造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

庞：此话怎讲？

诺布：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读过很多中国古典小说的英译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哲学思想，孕育出孔子、孟子这样的思想家，都是些塑造了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伟大哲学家。如今没有任何人物可以与这些历史人物比肩，这是一大憾事。

即使在历史上的一些动荡时期，中国也是人杰地灵。像鲁迅这样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实粉丝）可以在上海“躲进小楼成一统”，仍可以继续伟大的文学创作。

但在当今的中国，当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存在时，文学和创造力确实会受到

摧残。如果重大的政治变革发生，那么将会随之带来文化的变革，到那时候，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它的GDP，还会有它目前缺乏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

随着西藏局势变得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满，人们正在失去财产、失去工作。我告诉西藏人，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们必须与这个体制斗争。

庞：你即将出版的《来自被遗忘山脉的回声：西藏的战争与和平》(*Echoes from Forgotten Mountains: Tibet in War and Peace*)一书，讲述的都是西藏抗争斗士的故事。能介绍一点书中内容吗？

诺布：这本书将由企鹅出版社首先在印度出版，然后再翻译成中文。这本书讲的是西藏的抗争者、特工人员、士兵、农牧民、喇嘛、贵族、商人、妇女、官员，甚至还有街头乞丐，他们在西藏的自由斗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历史上起了到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他们都被人遗忘了。这本书旨在让他们的声音重新回荡在世界。

庞：听起来是一本引人入胜的重要著作。我期待着先睹为快，非常感谢你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普京的反对者